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五三期 ——  
(二〇〇八年六月十一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806d)

---

【拒绝遗忘】	反省文革我们还没走出阴影 ——专访《我虽死去》导演胡杰	张洁平
【罪行实录】	为历史作证——评胡杰获奖纪录片《我虽死去》	王容芬
【直面真相】	每个人都可以做历史义工	晋 松
【难忘岁月】	我的上书回忆	萧瑞怡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

## 【拒绝遗忘】

反省文革我们还没走出阴影  
——专访《我虽死去》导演胡杰

• 张洁平 •

独立纪录片导演胡杰追访文革中第一个被学生打死的校长的故事，还原那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但当年参与打人的学生没人愿意面对镜头，向受害者道歉。反思文革仍是禁忌，中国人远未走出历史的巨大阴影。

许多人知道胡杰这个名字，是从林昭开始的。

二零零四年，胡杰导演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悄然在中国各个高校、上了年纪的知识分子和年轻学生中流传。一九五七年的北京大学，那个中文系才女，那个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用鲜血写成二十余万字文章，“永远不放弃宗旨而改变立场”的刚烈女子，那个在青春年华被秘密枪决的瘦弱姑娘——第一次以正面的姿态，走进五十年后的现实，震撼了千万个心灵。

胡杰镜头下的林昭打动了许多人，也包括年逾八旬的王晶尧老先生。

王晶尧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近代史的学者，他的妻子卞仲耘曾是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副校长，文革开始时被殴打折磨致死，是北京市第一个被打死的校长。

得知妻子死讯的第二天，王晶尧买了一架照相机，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拍下妻子遍体鳞伤的正面遗体。他还保存下了妻子被打死时身上所有的东西，包括被血浸透的衬衫、裤子、背包、背包里的无产阶级学习材料。

他记录历史的深切意识打动了胡杰，胡杰拍摄林昭的态度也打动了他们。

在林昭之后，胡杰再一次让镜头聚焦文革，他给卞仲耘和王晶尧的故事起名叫《我虽死去》。王晶尧老人在镜头前，一点一点地讲述家庭的灾难，从箱子里拿出四十多年从没有打开过的包裹，展开已经变黑、发硬的血衣。老人时常沉默，眼里含泪，镜头静静地对著。这一次，胡杰的拍摄，镜头更冷，血更热。

零八年一月十二日，《我虽死去》获香港举办的首届华语纪录片奖最佳长片奖。胡杰的获奖感言只有一句话：“我希望这样的灾难，不要再在中国重演。”以下是胡杰专访的摘要：

你拍摄的故事对自己在文革年代的经历，会不会促成什么反省？

——其实，如果让我回忆我的文革，那是一个非常自由的状态。我是六六年上小学，七六年高中毕业，这十年刚好是我上学的十年。应该说小学六年级前就几乎没有上过学，天天玩，什么玩的都玩过了，上天入地，爬房子爬树，偷东西，打架。你要想想，那个少年时代是非常有意思的，到了中学，基础也很差，就是喜欢画画，喜欢看一点书。文革的记忆有很多种，看武斗看得心惊肉跳，大棍子打人看得真是害怕，但是毕竟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没有自己家里有亲人死去的那种疼痛。很多东西还是我后来通过拍摄，通过一个一个人的采访，才慢慢明白了那个历史究竟是怎么回事。

看《我虽死去》时，很震撼的一点是当年动手打死老师的都是十六七岁的少女。但大陆年轻人现在还不知道有这回事，这不是很悲哀吗？

——打死人那是太多了，如果把万分之一，或者十万分之一的故事拍成纪录片，都很震撼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想，犹太人遭受了纳粹那样的屠杀以后，他们留下了大量的纪录片、文学作品和影片。他们死了六百万人，从反右到文革这十来年，我们要比他们多很多倍，但是我们没有把这些留下来。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人要做这个工作的，起码是对历史的反思吧。文革是充满了非常复杂的因素的，打死人的人很多是怀着革命的热情和理想。没有一个知识系统告诉他们，这样的理想，可能就是犯罪。他们只知道太阳最红最暖，但是他们不知道，除了太阳以外，还有别的东西，可以支撑这个世界。现在在中国大陆有一个非常壮观的场面，每天早上、晚上，六十多岁的退休工人，他们都聚集在一起唱革命歌曲，唱得那么热情。我就在想，那个时代他们都是参与者，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没有别的东西来帮助他们认识、理解自己走过的这一段理想的道路。他们也不会唱别的歌，他们没有另外一个认识体系和知识体系，来反思自己这样的做法。

你有联系到当时参与打人的学生吗？

——有，联系到十几个人。我自己联系，王老先生也联系，我还找朋友去联系，他们都不接受采访。这也是我觉得这个片子缺憾的地方，没有学生在回忆当中进行见证。没有学生对那

样一个历史有一个反省。这是我想到了而没有实现的想法。原本我想，肯定我能找到一个学生，陈述她目击的事实，如果哪个学生参与了打人，哪怕打了一棒子、踢了一脚，她能站在镜头前，对自己的行为道歉。但是我没有找到这样的一个人。

他们用什么方式回绝呢？

——比如说，这个事儿已经很远了，我们记不清楚了，这是一种。第二种，我们工作很忙，身体也不好。后来我编出片子的第一版，编完后请别人带给他们看，我想让他们感动以后让他们说。他们后来回应我，片子我看了，一天晚上都没睡着觉，非常难过，但是我想了半天，还是不能接受你采访。这里面我觉得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人情关系。这些人都是同学，都在一个城市里，说什么呢？

还有一个当年给王老写匿名信支持卞仲耘的人，她跟你说了很多，但最后说现在还不是时候公开，没能拍出来，是吗？

——对，那个老师呢，我觉得她是很勇敢的一个人。她现在不愿说我特别明白，因为她的学生今天可能都是领导。她说，打死人的那天，她去了被打的另外一个校长胡志涛那里，她也被打得遍体鳞伤。她当天晚上用左手给王晶尧写了一封匿名信，出于良知，她要告诉她知道的和看到的这些情况，她觉得不应该这样做。你想想看，她那时候敢冒着红卫兵这样的势头去做这一件事，但她现在却不敢说话。

你觉得遗憾吗？

——不，我不遗憾。我觉得这是纪录片应该记录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还没有走出这个阴影。

在影片中间，你为何特别提到王晶尧年轻时的革命理想？

——我是想表达，他也曾经是一个青年人，而且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想当一个职业的革命家。这些人，多年后，他们却被他们的同样想当职业革命家的后代给消灭了。我们的历史没有走出革命这个怪圈。革命要革到哪一天，我觉得这本身也需要反思，我们的制度需要不需要别的方式。第二点，这个人他曾经受到的教育是这样：什么样叫好生活，罗斯福的话，“免于恐惧的自由”。那是那个时代的口号啊，是能和德国、日本法西斯抗衡的，统一起一股力量的口号。这个口号现在听来，反而变成了奢侈品。这是为什么呢？我是想展示两代人共同的革命理想，在某个空间，错位了。老先生自己说，生于梦想，死于梦想。我自己理解，生于什么梦想呢？追求民族的自由、民主、独立。而现在呢，敢于把历史真相说出来，其实是追求自由、民主的继续。

官方会怎么对待你这样的纪录片，有什么约束吗？

——这叫民间纪录片，他们不好限定。中国人红白喜事的录像也是民间纪录片，很多电视台也搞DV比赛，这些你肯定不能禁止。但像《我虽死去》这样的片子，应叫家庭录像。其实中国的导演都有尺度，他们都知道哪些题材不要碰，即使去碰，怎样去打一个擦边球。这种自我的约束，可能比警察约束还有效。

我要说一个非常现实的事情，就是从没有警察找过我麻烦。我拍片的时候，没有一个警察说，你不能拍，或是把你的东西没收，我没有遇到过。但是，所有人都以为我做的事是危险的，

我也以为是危险，但危险到什么程度，我想最多就是把你的东西收了，把你关几年，最多就是这样。但是，没有发生过，这是时代的进步。作为一个政府，我觉得应该用更宽广的胸怀去面对这件事情。但是我更希望是用法律和制度来做保证。

#### ◇ 胡杰小档案

一九五八年生于山东济南。七七年从军，当了十五年兵。十五岁开始习画，八九年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油画班进修两年，曾在北京圆明园画家村生活。九五年拍摄自己的首部纪录片《圆明园的艺术家长们》。九九年辞去新华社的公职，成为专职独立纪录片制作人。作品有《远山》、《迁徙》、《媒婆》、《在海边》、《平原上的山歌》、《寻找林昭的灵魂》、《我虽死去》等。

□ 原载《亚洲周刊》

~~~~~

#### 【罪行实录】

#### 为历史作证——评胡杰获奖纪录片《我虽死去》

• 王容芬 •

一具中年女尸，凌乱的灰发，浮肿的面庞，鼻梁上一道青痕，口角残留着溢出物，右肩和上臂布满扎伤血痕，双腿大面积淤伤，双腿和两足浮肿。死者名卞仲耘，生前系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1966年8月5日死于该校校园，时年50岁。

#### ◇ 也曾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死者的丈夫王晶尧先生当晚9时左右回到家中，接到学校通知他卞仲耘受伤被送邮电医院的电话。王先生当即带着3个小孩子赶往医院，长女王学随后知道了也赶到医院，一家人看到的却是亲人遍体鳞伤的尸体。在医院里，王先生与女附中学革委会红卫兵代表发生争执，拒绝解剖尸体，因为对方明显要将死因归于死者生前患高血压、心脏病。医院屈服于在场红卫兵的压力，在死亡证明上写了“死因不明”。在王先生一再坚持下，红卫兵负责人之一刘进在一张字条上写下了她和其他6个人的名字，为首的是宋彬彬。

第二天，王晶尧先生买了一架照相机，从各个角度拍摄了尸体照片，全身的，半身的，头部的。尸体火化时，王先生拍下了焚尸炉烟囱里飘出的一缕青烟，那是亡妻的冤魂。文革结束后的30年里，王晶尧先生一直通过司法和政治途径为卞仲耘申诉，状告一个叫袁淑娥的教唆犯，投诉有门，但告不动罪犯。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80西检审刑字第72号）“不予起诉决定书”以事件逾期为名，拒绝立案。王先生继续上告了9年，一直告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高人民检察院答复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以同样理由拒绝立案（1989年4月2日高检字第101号）。王先生在这份堂皇虚伪的红头文件背后写下对中国法治的评价：“法治其名，人治其实，官官相护，何患无词！”

#### ◇ 黑白分明的罪恶

2006年，独立制片人胡杰扛着沉重的摄像机，走进和王晶尧的家和案发地女附中校园。

打开一只旧皮箱，里面有：一个二寸见方的小盒子，盒子里一把华发、一块手表，指针停在3点40分，金属表带扭裂了；一件皱巴巴的血衣，背后的墨迹依稀可辨“打倒”俩字；一

条同样皱巴巴的内裤，沾着失禁的粪便；一条满是泥土和血污的裤子，一双溅着血迹的袜子，一些曾经用来擦拭伤口的纱布块。再加一架老式相机，一封匿名信，这些和5位证人，共同为40年前那个集体谋杀案作证。胡杰拍完，剪辑成66分钟的纪录片《我虽死去》。

#### ◇ 毛泽东的暴力

影片里，王家长女王学压抑着悲愤，平静地陈述1966年8月5日晚上在邮电医院所见母亲尸体上的致命的伤痕：“母亲头上右后方有一个血窟窿，右上臂也有一个血窟窿，血还在往外渗……回家后，父亲看到从医院拿回来的母亲内裤上的大便，痛不欲生，抱头趴在凉席上，席子被啃烂了一大块。”

残酷的批斗是8月5日下午两点开始的，当年女附中学生王友琴说，卞仲耘等5位学校负责人跪在大操场的台子上，她听见有人喊“到木工房去拿棍子！”

林莽先生从图书室窗口看到的红卫兵们，已经是全副武装，个个手持木棍或木枪，木枪是民兵训练用的。她们一律草绿军装，戴红底黄字红卫兵袖箍，腰扎钉头皮带，脚上是翻毛牛皮军靴。5位学校负责人被她们押着游斗，卞仲耘领头走在前面，一手拿铁簸箕，一手拿根木棍儿，脸上涂满墨汁，只看见两只眼珠子，张口喊时露出白牙。红卫兵强迫她喊：“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是走资派！我有罪！我该斗！我该死！砸烂我的狗头！”她喊一句，就敲一下簸箕，反反复复来回来去喊。声音小一点儿，红卫兵的木枪和短棍就打过来。她后面跟着的副校长和主任们也都是墨汁浇黑了脸，手里敲着破脸盆、铁簸箕大声号叫。他们的嗓子越喊越哑，红卫兵的长枪短棍越挥越勤。卞仲耘挨打最多，一个红卫兵一脚踢到她肚子上。卞仲耘捂肚子，红卫兵的牛皮靴就踢在她的手背上，痛得她尖声大叫。几翻折腾，卞仲耘倒在地上。红卫兵们拥上来，骂她装死，好几只牛皮靴往她身上乱踢。红卫兵们踢累了才住脚，又喊：“砸烂她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一个大高个红卫兵便把穿着翻毛军靴的脚踩在卞仲耘身上，做出雕塑的姿势。打累了骂渴了的红卫兵坐在一旁吃冰棍，嘻嘻哈哈狂笑。卞仲耘他们则要搬砖挑土运沙子，你搬过来，他再搬回去，劳动改造。卞仲耘迈不开步，一踉一踉地蹭。

林莽再次见到卞仲耘，是在女生宿舍东边女厕所外面。红卫兵带着他去那里，让他给卞仲耘找打扫厕所的笤帚。林莽看见卞仲耘的衬衫上有血，后来才知道，红卫兵打人的棍子头上全钉着钉子。卞仲耘已经站不住了，一只手扶着过道的墙。王友琴至今记着那天宿舍楼白墙上的一大片血点子，还有一个血手印。

林莽把笤帚递给卞仲耘，她还没接住笤帚，就出溜到地上，双目紧闭。一个红卫兵朝她吼叫：“你又装死！起来！”她起不来了。另一个红卫兵去盥洗室端来一盆凉水，兜头向她泼去，淋得她全身都是水。林先生看不下去，去了他工作的图书室。

林莽最后一次见到卞仲耘，是在女生宿舍正门，也是红卫兵带去的。刚进正门，就看见卞仲耘仰面躺在正门台阶上，眼珠向上翻，口吐白沫，浑身是水，抽搐不止。红卫兵命令他和校工老白把卞仲耘抬上一辆平板车。抬起来时，卞仲耘鞋里的水哗哗往下流。

卞仲耘死在平板车上，身上盖满大字报，大字报上压着一把大竹扫帚。她是文革中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王友琴叙述了学生对校长之死的冷漠：“第二天早上，学生都坐在教室里听广播。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是高三学生，也是红卫兵负责人之一，在广播喇叭里说：‘昨天晚上，卞仲耘死了。’教室里静了一下，有人说了句什么，话题很快转到别处。死了一个人，她是牛鬼蛇神，她被打死了，根本不被当作一件事情，甚至不需要议论一下。”

好在成年人明辨善恶，王晶尧的同事王来棣女士当时敢于同情他的遭遇，40年后敢面对镜头谴责红卫兵暴行，这在今天的中国还不多见，人们还有顾虑。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一位教师给王晶尧先生写的封匿名信：

老王同志：

老卞在女附中为党工作17年，她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心里清清楚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老卞同志就被活活打死。据亲眼看见的人说，她被很多带钉子的粗木棒和板凳腿乱打，罚下跪，罚挑土，挑不动，就乱棒猛击头部、上身。她后来又被罚去扫厕所。刚登上第三曾台阶，她就一头倒在宿舍楼的台阶上，当时大小便失禁。我是一个普通的教师，我不愿意写下我的名字，也不愿暴露我的笔迹。

师大女附中一教师 8月8日2时

那样的深夜，提笔为卞仲耘之死作证，需要何等勇气！40年后，胡杰找到了这位正直的女教师。她已经75岁，给胡杰讲述了当年卞仲耘被打致死的前前后后。打死卞校长那天，这位老师还去看望了胡志涛副校长，胡校长被打得14处骨折。但是她仍不愿暴露姓名，也不愿出镜发言，她说：“时候还没到。”

卞仲耘死于红8月，死于毛泽东释放出来的红卫兵暴力。7月30日，毛泽东撤了刘少奇派到各学校领导文革的工作组。7月31日，女附中成立红卫兵。由宋彬彬、刘进等红卫兵头目组成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为无政府状态下的临时权力机构，“筹备小组”四个字很快被忘记了，权力与“革命委员会”挂钩，成了校园政府，代表国家行使起暴力来。王晶尧说，8月4日就开打了，用棍子打，那天卞仲耘回到家里，撩起上衣给他看背上的伤。他让妻子不要去学校了，出去躲一躲。卞仲耘却准备好了死，而且洗得干干净净去让她们打死。王晶尧说妻子不离开，因为她认为自己没问题，她要保持人格尊严和清白，绝然赴死。

8月5日，副校长胡志涛一上午跑遍新市委等京畿衙门，要求他们出面制止红卫兵暴力，没有人理睬她。下午惨案就发生了，胡志涛本人也被打成终生残疾。

#### ◇ 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

卞仲耘被红卫兵打死的那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政治局会议，会议休息时，他在报纸的一角写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又过了13天，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身份第一次接见全国红卫兵。宋彬彬等40名师大女附中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宋彬彬给戎装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毛泽东振臂高呼：“红卫兵万岁！”

毛泽东肯定了红卫兵，肯定了宋彬彬。因为毛泽东的一句“要武嘛”，第二天宋彬彬以宋要武的面目问世，并参与决定给女附中改名“红色要武中学”，随后“要武小学”、“要武中学”跟风而起，从此红色恐怖笼罩全国。王晶尧先生提到女三中校长沙坪和八中党总支书记华锦之死，这两位女士死得比卞仲耘还惨，沙坪被逼喝痰盂里的水，在8月19日晚上和20日上午遭到毒打死亡，华锦的尸体被挂在暖气上。40天里，仅北京的红卫兵就打死了1700多人。

#### ◇ 刘少奇的暴力

即使工作组不撤，卞仲耘、胡志涛们也逃不脱厄运。王晶尧先生用那台照相机追拍了工作

组治下的迫害。工作组1966年7月3日呈报上级的“四类学校大女附中领导核心排队的初步意见”，第一句话就决定了她们作为阶级敌人的命运：“师大女附中是北京市重点学校之一。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群众揭发了领导核心的大量问题，性质是严重的，初步排为四类学校。”理由是“学校领导权把握在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中”，卞仲耘、胡志涛就是这样的人物，她们都被划为四类干部。四类是最坏的一类，是铁板钉钉的阶级敌人。

意见书给卞仲耘定的罪状是：“多年来一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诬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顽固地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收罗和重用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份子；极力向青年师生放毒，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搞宗派活动，培植个人势力；贪生怕死，追求低级趣味，十分欣赏武则天、杨贵妃、慈禧太后等荒淫无耻的私生活，有时讲话非常低级庸俗。划为四类。”凭着这些罪状，卞仲耘足以被开除党籍、公职，进而押送监狱或发配北大荒了。

王晶尧先生拍下了工作组所说的“群众揭发”大字报和漫画的一部分。6月23日，外校教师袁淑娥带着100多个女附中的学生来他们家里贴大字报，从大门外贴到屋里，每张都有房门大。王晶尧从楼梯上拍下贴在他家大门上的大字报：“漏网的大右派，与前市委有密切联系的大黑帮份子，反共急先锋，对革命师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大混蛋，大恶霸，你他妈的放老实点，否则饶不了你。”这一张是“正书”，其它几张大同小异，除了政治帽子，就是下流的辱骂和威胁。

大门外左侧墙上是毛泽东语录和空空洞洞的“严正声明”，右侧是骂杀：“竖起你的猪耳朵听着，你再敢胡作非为，千刀万剐了你！师大女附中中四三”这张下面还有一幅名为“卞母猪的丑态”的漫画，画着一个猪身小丑，撅着屁股摇一面三角旗，上书“我是女混蛋卞”，“卞”字下面加一个带括号的“便”字。这些花季少女满嘴杀剐，辱骂人没有底线，她们的语言暴力与8月5日的行动暴力相映成黑。

进到里面，每间屋的门上都糊了大字报。洗手间俨若私设的公堂，左边门框上“坦白从宽”，右边门框上“抗拒从严”，中间门上“老实交代”，下面是大字报：“警告卞毒蛇，不许你再骑在劳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告诉你，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只许你规规矩矩，不许你乱说乱动。你胆敢不低头认罪，我们就坚决专你的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撕大字报，就是抗拒革命。”

卞仲耘卧室门上贴着：“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就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扒你的狗皮，砍你的狗头！告诉你，现在是劳动人民的天下，你他妈的敢动劳动人民一根毫毛，我们就宰了你！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门的另一面是：“你他妈的放老实点，否则饶不了你！”

王晶尧房间的门上贴着：“卞狐狸精、母夜叉（卞仲云）你休想回家逞凶！在学校，你这个堂堂的大校长，总支书，早就被同学斗得威风扫地，在斗争会上，在革命师生的讨伐声中，索索发抖，猪毛蓬乱，头顶破筐，猪脸发紫，两腿发瘫，手捧高帽，冷水淋头，口衔黄泥，如若落水猪。回到家里，穷撒泼，凶神恶煞，一付地主婆模样，任意欺压、虐待劳动人民，竖起你的猪耳朵听着，你再敢胡作非为，千刀万剐了你！师大女附中 中四三”。中四三的女生使尽了糟践人的本事，却错字连篇，连校长的名字都写错了。

她们连孩子们的房间也不放过：“警告卞母猪及她的猪崽子们，不许你们横行霸道为非作歹！”

宪法保护的公民居住地，可是一个中学校长家里大天白日闯进100多人，肆无忌惮辱骂、

威胁主人，这事发生在法制尚在的刘少奇治下，公、检、法都还没受到冲击。刘少奇留守京城主持执政党中央日常事务，未经法律程序，擅自派工作组插足学校，下令停课闹革命。国家主席不去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反而挑头儿作乱，为毛泽东大乱天下决开大堤，洪水猛兽，不可收拾。

6月22日，工作组主持召开了空前残酷的打人斗争大会。袁淑娥一家三口上台，工作组听任袁揪住卞仲耘的头发发泄私恨。这些大字报是对斗争大会的补充，用以巩固打斗争战果。

6月29日，卞仲耘给派工作组下来的党中央写了一封呼救信，反应自己在批斗会上遭受的暴力和侮辱，举报了恶毒煽动的袁淑娥：

……在群情激愤之下，我遭到了拷打和种种折磨。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没有说过的话，没有过的思想和意图，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决不能承认。因此，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叫将上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唾沫……。

突然遭受这样的拷打，加之早上和中午都没有吃饭，下午滴水没有进口，脸上身上汗流如注，身体实在难以支持，一再瘫倒，甚至晕倒在地上。这时，就有人用一盆冷水往我头上浇，用手揪我的头发，把我从地上拖起来，还叫恢复原来的姿势。象这样，晕倒了，用冷水浇头，再揪着头发拖起来，共有三、四次。

当我被折磨得最不像人样的时候，还有人给我拍了照片，大概还不只拍了一张。等到把我折磨够了，天快黑了，会快结束了，那个阴险恶毒的坏家伙袁淑娥又登台了。她感到用借刀杀人的办法把我折磨成这个样子还不够解恨，竟敢直接揪我的头发，我对这个可耻的家伙进行了反抗。她一方面假惺惺地叫被她蛊惑、利用的学生们不要再打我了，说光打不解决问题，一方面更加阴险恶毒地煽动大家对我要在政治思想方面继续进行“揭发”，以便证明我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个斗争大会一直开到七点多钟才结束。

刘少奇的工作组6月3日进驻校园。6月2日宋彬彬、刘进、马德秀3人贴出师大女附中第一张大字报，表白“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攻击校领导，与6月1日晚北大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全国广播只有不到十小时的时差。工作组一进校门，就旗帜鲜明支持这张有来头的大字报，宣布女附中停课闹革命。当时，宋彬彬的父亲宋任穷任东北局第一书记、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刘进的父亲是教育部副部长。给毛泽东献袖章的时候，宋父已经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进入最高权力中心。无论是刘少奇的文革，还是毛泽东的文革，卞仲耘都逃不脱宋彬彬们的魔掌。皇家女校校长，不过是贵胄们的仆人，在一个“老子英雄儿好汉”的世袭社会里，好汉豪女们处死他们的校长、老师是天经地义。工作组7月3日上报的“四类学校大女附中领导核心排队的初步意见”，既肯定了6月下旬的打人大会和闯入卞仲耘家贴大字报的暴力行动，也宣判了卞仲耘的政治死刑。

#### ◇ 跟着共产党走向死亡

卞仲耘的死期还不自1966年6月始，工作组审查意见书追溯她的历史到1944年参加工作，1941年入党，说她“出身于大地主家庭，曾夸耀自己是带着黄金首饰参加革命的。”按照中共文革流行的血统论，就是说，卞仲耘这样的人根本不该入党，不该进入革命队伍，死亡之路早在她加入共产党之时就开始了。



卞仲耘和王晶尧都是三八式干部，他们都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以革命为志业，当年选择新闻专业，就是因为这个系课程少，他们有更多时间投身革命。王晶尧展示了1944年底在成都燕京大学组织的宣传民主、反法西斯的大规模展览照片和与李慎之等参加反抗四川省政府的双十运动友人的合影。王先生说，那时就是往枪口上冲，好多人牺牲了。

影片里响起卞仲耘生前最喜欢的歌曲《太行山上》，王晶尧和卞仲耘曾在太行山上的陕北电台工作。王晶尧拿出一块小巧的坤表，这是卞仲耘从继母手里继承下来的，当时电台没有一台准时的钟表，借了这块表定时。

1966年8月4日、5日、6日三天里，王晶尧失去了青年时代以来三位最亲近的人，祁式潜、卞仲耘和刘克林。

祁式潜出身官僚世家，曾祖祁隽藻是道光 and 咸丰年间宰相，历任国子监祭酒、户部右侍郎、兵部尚书、户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兼任道光皇帝的上书房总师傅、咸丰皇帝的太子太保、同治皇帝的弘德殿授读，有“三代帝王师”之称；祖父祁世长历任翰林院编修、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事务；父亲祁友蒙历任南河同知、湖北知府。祁式潜比王晶尧夫妇参加革命还要早，是1935年12·9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之一，但他命运坎坷，打下天下却失去党籍，直到1956年才被批准重新入党，级别、待遇都从那时算起。祁式潜不仅是王晶尧的战友，也是同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文革一开始就被打成反革命分子，8月4日晚服“敌敌畏”自杀，卒年51岁。3年以后，祁式潜夫人居瀛棣也选择了这一条路，卒年53岁。居瀛棣是国民党元老政务院院长居正之女，1936年放弃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业参加革命，抗战胜利后在重庆和上海参加中共隐蔽战线，协助完成了许多重要地下工作，死前为故宫博物院馆员。

刘克林是王晶尧夫妇大学时的同学，出身官宦，其父为民国政府海军部少将司长，主持海军编译局。刘氏14岁即参加共产党，也有一段丢了党籍的坎坷，1957年才被批准重新入党。刘在大公报供职多年，有“一代报才”之誉，文革初期任职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处，被副部长姚溱株连。7月23日姚溱自缢，8月6日下午，刘从中宣部办公楼5楼砰然坠下，卒年42岁。刘死前无异兆，没有遗言遗嘱。

他们都出身于有社会地位的殷实人家，无衣食之虑，无思想之固，黄发垂髫，一腔热血，投身革命，万劫不复。他们躲过共产党的一场场死亡运动，最终在文革死亡游戏中丧生，被逼死、害死、乱棒打死，骨灰不存，魂灵无系。卞仲耘作为文革中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她的名字无法淹没；祁式潜和刘克林虽然为共产党轰轰烈烈过，却少有人知道这两个名字，如果没有王友琴的文革死难者名单，我也找不到他们；居瀛棣的名字更鲜为人知，我是在台湾李敖先生一篇“居正女婿辨”里偶然发现的。文革死了多少人，国家没有统计，死了多少共产党员，党内也没有统计。1980年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曾向邓小平先生提出这个问题，邓答道：“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

亲人和友人一个个死去，在死亡面前，王晶尧觉醒了：“我这四十年来，一直生活在记忆中，我身上背着十字架，这样一个典型的惨案，一个人的生命没有了，一个家庭被摧毁了，不仅仅是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遭遇。耶稣扛着自己的十字架，我是在帮着扛十字架，我现在还扛着。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我有责任，只有我有责任，包括我的孩子在内，他们所理解的，所感受到的，所想到的都不能和我一样，因为我是亲身经历者，如果我不把这些真相揭露出来的话，那就是没有尽到责任。用我一句话，我就白活了。这是我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总结一生，概括为8个字：“生于梦想，死于梦想。”他要把这8个字写在自己的骨灰

盒上。

影片中另一位证人林莽先生，接受采访时已经90高龄。林先生14岁参加革命，建国后被打成胡风反党集团成员，从大学降到女附中，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从语文教师降为图书资料员，文革中被罚扫厕所。他也和王晶尧先生的朋友一样，曾经想用死来证实自己的清白，而且是和无靠的母亲同归于尽。母子俩手拉手坐在木床上，握住电线，接好拉线电源。灯泡炸了，人却没死成。事后林莽听学校里物理老师说，因为两个人当时都没接触地面，处于绝缘状态，所以没死成，如果有一只脚着了地，两个人必死无疑。

近日获悉，林先生是在宋彬彬两次提审他之后做出自杀决定的。第一次提审，宋让他交代少年空军学校的事，旁边站着一个1米8多的粗壮男生，当胸重重给了他一拳。林先生被打倒在地，躺了半天起不来。第二次是深夜，林先生与历史老师朱学希一起被宋彬彬提审，宋彬彬坐着，让他们跪着，旁边站着几个女红卫兵。红卫兵们用皮带抽他们，林先生挨了打，朱老师被抽得更厉害。那天夜里林莽决定与母亲一起触电自杀。他至今清楚记得，宋彬彬与众不同，两次都没穿红卫兵军服，而是绸衬衫和裙子，弱女子的身材。林莽先生92岁了，对生命中最残酷的一幕记忆尤新，同时被殴打的朱学希老师也还在世。私设公堂的宋彬彬没有动手打人，她只是坐着审讯她的老师，罚他们给她下跪，对老师动拳头、抡皮带的都是站在她身边的打手。胡志涛老师的肋骨不是宋彬彬打折的，卞校长和后来遇难的几位女附中老师以及北京市和全国的死难老师和同学，没有一个是宋彬彬亲手打死的，但是给“要武”的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是宋彬彬，而且她至今视为无上光荣。可以辩论红卫兵袖章是不是血染红的，但是死在红卫兵手下的无数有血有肉的生命是不争的事实。

从死亡的诱惑中解脱了的林先生大彻大悟了，决定不再去死，直面红卫兵的暴力。说到文革中依然兢兢业业，抢救图书，老人摇头长叹，对胡杰说：“愚蠢啊！你真想不到我有多么愚蠢！”

影片最后是一个“北京市教育系统部分文革受难者名单”，单位名下是黑底白字的人名，像黑暗中的白骨，诉说他们在那个野蛮的年代怎样死去。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名下，卞仲耘后面还有8个名字：胡秀正、梁希孔、周学敏、赵炳炎、宗传训、王英同、关炳衡、王永海（失踪）。“北京大学”名下的死难者名单占了3个页面，有些名字很熟悉，都是业界精英。名单长达5分钟，一排排白骨组成的长城，比红色高棉的人头骨墙更加坚实、壮观。这仅仅是王友琴女士收集的文革死难者中一小部分，如果把文革中全部死难者的名单排出来，一部长达一年的影片也难尽述。

#### ◇ 没有底线的卑鄙

《我虽死去》讲的是文革中学生打校长的故事，有被打死的校长，却没有打她的学生的镜头。铁证如山，言之凿凿，凶手却自始至终不露面。假如是刑侦片，这样安排无疑是个败笔；作为纪录片，这个空白越发令人遗憾。除了义不容辞的王友琴，连个出来作旁证的当年女附中学生都没有。那一代人阙如，无论作为凶手反省，还是作为目击者作证，没有人出镜，是这部杰出影片明显的缺憾。

胡杰尽了力，王晶尧也尽了心，但是他们没有争取到一个人出镜或者仅仅出声儿。凶手不用说了，目击者有种种顾虑，人情大于人命，是这一代文革遗民的道德。当今中国，正是这一代人支撑着不尊重生命的红卫兵政权。

王晶尧是一个宽厚的苦主，他只控告过袁淑娥，这个校外人员曾经是卞仲耘的熟人，一个恨人不死、恨天下不乱的恶人，借文革报私仇，到女附中全校批斗校领导的大会上“控诉”卞

校长，煽动情绪，又带领学生去卞校长家中贴大字报。袁淑娥犯有诬陷和教唆罪行，对卞仲耘直接动过手，闯过家，对卞仲耘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

王晶尧没有控告打人的红卫兵，她们毕竟是卞校长的学生。他毫不介意他们是否“道歉”，更没有等待手上有血的人“道歉”。他只是希望她们真心悔悟，救赎自己。夺人生命怎么能只靠一句道歉就了结？！有人说“王先生等待了40年”，王先生自己说，他从未等待过什么道歉。该对全体文革受难者悔罪的是当权者！当年的红卫兵们却连自己迷恋的“道歉”之说也没有身体力行，她们已走过半个多世纪的人生之路，这些老兵虽然劳燕分飞，天各一方，却死死守着当年恐怖暴行的秘密，没有一个人打破死一样的沉默。

《我虽死去》在网上传播后，有两个当年的学生来到王家。王先生激动、欣慰，热情招待她们，跟她们合影留念，后来还把这张照片寄给一家历史杂志，虽然她们并未道歉。

这两个人后来再没去过王家，倒是见了回国定居的宋彬彬好几次，有她们发在网上灯红酒绿的照片为证。从此女附中的老红卫兵们打破了沉寂，一个恶毒下流的诽谤在他们中间不胫而走：“王晶尧都85啦，家里还养着小蜜！一边搞小蜜，一边给前妻喊冤，两头儿全让他占了。”时间没有洗刷这个老红卫兵群体的罪恶，年龄没有改变她们的下流，她们仍像40年前一样，凭借充满卑鄙的想象力诽谤人，靠着浸透毒汁的舌头谋杀人。

所谓小蜜，那年已经75岁，是一位丧偶的退休大学老师。影片中有她一个镜头，一双手给王先生端来一个饭盒，然后是一个蹒跚走向厨房的背影。对这位女性，王先生眼里尽是敬意，话里充满感激：“我这个老伴儿，我对她说过很重要的一句话，我说，我有这样一件事，我要做这样一件事，希望你支持。她同意了，我们才结婚，30多年了。她很同情我的不幸遭遇，对我一直照顾得非常好。对几个孩子，不是亲生，胜似亲生，感情非常非常好。”

这样两位可以作她们父母的老人，热情接待了两个不速之客，没有揣摩她们登门的动机，更没有想到她们会编造恶言，传播蜚语。王晶尧先生家墙上挂的都是基督教绘画，他特别喜欢那幅《圣母子》版画，因为母与子两对眼睛里传达出人类最深沉的爱。两位老人以德报怨，收获的却是作践。墙上那幅《最后的晚餐》画的是人的背叛，学生的背叛比起犹大来，无耻尤加。《马太福音》里说，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了，把那30块钱拿回来还给祭司长和长老，承认自己犯了罪：“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殿里，出去吊死了。在女附中的红卫兵们面前，犹大当得起义人，看到结果，立即认罪，承担罪责。她们40年都没达到犹大的觉悟，而且继续堕落。

王晶尧先生保存的女附中学委会代表字条上有宋彬彬、刘进的名字，这两个名字出现过3次：6月2日贴大字报，7月31日成立红卫兵，8月5日在卞仲耘尸体面前，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无论刘少奇的文革，还是毛泽东的文革，都离不开她们。她们始终站在文革的主动方面，既得到刘少奇的支持，也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宋彬彬献给毛泽东袖章上面的“红卫兵”3个字，是刘进等人从“红旗”杂志、“人民卫生报”、“为女民兵题照”3处集来的，镂空刻在硬纸板上，用油墨滚筒印在红布袖标上。她们处心积虑，机关用尽，不同于跟风而起的红卫兵。卞校长遇害时，宋彬彬和刘进是校革委会的负责人，都是年满18岁的中共党员，对卞校长之死负有不能逃脱的法律责任。

#### ◇ 法兰克福市政厅前的正义女神雕像

西方法院正门大厅里通常都站着罗马神话中的正义女神，一块黑布蒙住双眼，无分亲疏厚

薄，左手执正天平，右手仗义持剑。拉丁系语国家的司法一词都从正义女神的名字 iustitia 演化而来。意大利文是 Giustizia，西班牙文是 Justicia，德文是 Justiz，法文是 Justice，英文中的司法、审判与正义是同一个词 justice。

本杰明·哈里斯是一位美国检察官，在为民伸张正义的岗位上战斗 23 载，近年一直追踪红卫兵犯罪集团。检察官看完《我虽死去》，怒不可遏，拍案断喝：“宋彬彬、刘进以及所有红卫兵们，别太沉缅于舒适的晚景。我们决不会忘记！”你们听到正义女神的剑在悬响吗？

#### ◇ 绚丽奢华的“光荣”

胡杰和影片里的几位证人想借文革 40 周年之际提请当局和国人注意那个至今未结的案子，却被禁演。《我虽死去》至今未解禁，还连累 2007 年的“云之南纪录影像展”遭腰斩，殃及 46 位参展者的 39 部影片。那位给王晶尧先生写匿名信的 75 岁老人不幸言中：“时候还没到。”

《我虽死去》无涉色情与暴力，没有触犯国家广电总局、文化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影视音像制品审查制度里的禁令。影片不能上演，原因仅仅是触了文革雷区。

去年 9 月，一部叫《光荣与梦想》的纪录片问世，制成光碟，长达 2 小时 10 分 49 秒，每张售价 10 元。此碟与《我虽死去》在时代、人物和个别画面上都有重合，但网络、门市畅销无阻。

《光荣与梦想》记的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90 华诞庆典”，实验中学就是卞仲耘生前所在的师大女附中。关于这所学校，卞仲耘的前任，林默涵夫人孙岩校长说过：“有人给我们学校做过统计，说我们学校的学生中有党中央主席的孩子，有共和国主席的孩子，有 6 个元帅的孩子，有 12 个副总理的孩子，再往后数就数不清了。老师们曾开玩笑说：如果我们召集家长会的话，可以开大半个政治局会议啦。”这话是炫耀，也是这所皇家女校的实情。孙校长幸运，早早调离，逃脱了卞校长那样的厄运。

《光荣与梦想》证实了孙校长的话，这次庆典大红榜上果然皇亲国戚济济一堂，连毛泽东在世时就被逐出宫墙的儿媳妇都没遗漏，更加抢眼的是那些官居正三品的校友。让我惊骇的是，这个权贵方阵里也有当年很风光的红卫兵头领，例如自己不动手却让身边打手出拳头抡皮带的宋彬彬，例如和她一起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的马德秀。30 年前彻底否定文革，她们因为打砸抢的历史，当在“三种人”之列，今天宋衣锦还乡，马加封副部级大学党委书记，双双堂而皇之卷土重来。

#### ◇ 校庆纪念册里卞仲耘和宋彬彬的照片

胡杰影片里跟在卞校长被打死后面那个“8.18”天安门城楼上的镜头，也出现在《光荣与梦想》里，不过是在开头部分，人物位置也不同于胡片。嘉宾们进入人民大会堂，打开一本装帧精美的书，宋彬彬给毛泽东献红卫兵袖章的照片就赫然跳出，对页上是卞仲耘模糊的照片，仿佛“8.18”以后卞仲耘还健在，自豪地看着给毛泽东戴袖章的宋彬彬，看着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红卫兵、军训的红卫兵。给这个画面配的解说词是：“在九十年的悠悠长河中，实验中学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志士才俊，积淀了深厚的人文底蕴。”志士才俊，显然指画面上的宋彬彬。选这一张代表照片阐释宋彬彬的内涵，我自然联想到胡杰影片里卞仲耘的死。

这张与卞仲耘之死分不开的宋志士与毛泽东的合影出现在《光荣与梦想》光碟里，出现在

《光荣与梦想》纪念画册里，又特别在9月9日这个特殊的日子出现在女附中校园里竖起的大型展板上。9月5日是校庆日，9月9日是毛泽东忌日，这张照片到底纪念什么呢？肯定不是纪念41年前被红卫兵打死在这个校园里的卞校长。校方一而再、再而三在“光荣与梦想”的光环里炫耀这张照片，究竟要给学生树立什么样的荣辱观、灌输什么样的梦想？

袁爱俊校长是这场华诞庆典的上下人物，幕前表演，幕后操纵，台上督阵，台下逢迎，从开场致辞到挤进教师大合唱营盘收场，可谓鞠躬尽瘁。她是光碟《光荣与梦想》的总策划和总监制，版权页上除了袁爱俊的名字，还有35个人名和5个参与制作的专业单位名称，总导演是当过央视春晚总导演的王洗平，下设5位导演，中央电视台和中国新闻社联合摄制。这里有势利眼的谄媚，暴发户的炫耀，得着机会狠狠捞一把的贪婪，但是，仅凭这些基本功，袁校长能量再大也难撑起这么大的台面，何况上任不到一年，脚跟还没站稳呢。

庆典会场设在人民大会堂，央视新闻首播罗京主持，包括各级领导人和外国使节在内的近6000名人出席，规模远远超出了孙岩校长炫耀的半个政治局会议，场面堪比春晚，效果直追当年《东方红》。全世界还有哪一家中学能在国会大厦开派对？一个育人的学校跑到议政的地界作秀，先乱了规矩。2500年前孔夫子就主张有教无类，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教育部的实验学校却只瞄着皇亲国戚、达官显贵，还要映片卖碟，推广全国，为反文化、反人类的“老子英雄儿好汉”现身说法。“各级领导”多方支持，甚至请来外国使节观看这种愚昧表演，丢国家的人，现民族的眼，天地之间，咄咄怪事！

王晶尧先生在给袁爱俊的公开信里指出，将宋彬彬的活动和“8.18”事件作为光荣业绩加以炫耀，是对中国全体文革受难者及其家属的再一次最严重的伤害，对历史的亵渎，是公然诱发“文革”卷土重来的危险信号。出席庆典的“各级领导”不会不知道这个学校那段与宋彬彬分不开的历史，不会不知道这个学校的红卫兵最先打死了校长。41年后，他们在文革暴力的发源地举办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校庆秀里扎扎实实扮演了复辟先锋的角色。

胡杰影片里请不到的人，都拿了请柬为《光荣与梦想》充数儿，《我虽死去》里的主人公卞校长遗属却没有受到庆典邀请。两部纪录片，两种鲜明的立场，两个不相称的营垒。按照先后顺序，是《光荣与梦想》挑战《我虽死去》？CCTV叫板胡杰？

一位远在芝加哥的中国学者，把两位八、九十岁的老人和一个不十分专业的独立制片人撮合起来，没有一分钱外援，各自投入对历史的责任感，共同做出60几分钟的黑白片。今年一月，香港“二零零八华语纪录片奖”的评委们把长片组最高奖授予《我虽死去》。面对滚滚复辟浪潮，几位小人物挺身而出，为那个疯狂年代的滔天罪行留下见证，是这部纪录片的价值。

□ 原载《观察》网站

~~~~~

【直面真相】

每个人都可以做历史义工

• 晋 松 •

晋松先生您好！3个多月前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90年校庆将宋彬彬评为知名校友，此事在海内外引起普遍谴责。12月22日，文革罹难者卞仲耘先生之夫王晶尧先生发表公开信抗议。《观察》网站也就此做了“文革波澜”的专辑，您是最年青的文革研究者之一，《观察》很想请您给读者谈谈您的看法。

◇ 80后成长起来的文革研究者

《观察》：您从事文革方面的研究多久了？起初是什么促使您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

答：首先要说明的是，我是1979年出生的，是后“文革”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所以这注定了我对于“文革”的关注时间还是比较短的，另外，我本人并不是历史专业出身的人，对于“文革”，还是基于对历史的兴趣以及良知、道义上的同情，算是“业余”人士。对于真正的“文革”研究学者来说，我只能算是一个“关注”者，和道义上的支持者、“历史的义工”那类人。

最初对“文革”感兴趣，大概是1993年，当时是“毛泽东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官方当时的高调“颂圣”活动反而让我将注意力转向对“文革”的了解与关注。1993年，我14岁，算是“大孩子”，这样的年龄根本不可能有现在这部的历史感悟与精神体味，完全是出于一种“猎奇”，第一次到北京的旧货市场，被市场上琳琅满目、千奇百怪的“文革”遗物所吸引，随着这些资料的收集，我慢慢深入了解，并且有目的、有针对性地进行收集。渐渐地，小有收获，并开始着手整理并将“文革”资料上传到网上，与大家分享。

《观察》：从事文革研究过程中，您有没有受到过来自外界的压力和人为障碍？

答：在研究、关注过程中，我始终有一种“孤独感”萦绕心中。这种“孤独感”并不是简单的“兴趣”倾向的问题，不是那种“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情况。我所说的“孤独感”，是那种在精神层面的“不被认可”感，进一步说就是，我周围的朋友们并没有意识到研究“文革”有什么意义。在没有深入了解的情况下，就顺应了某种旧有的思维模式将我这种行为定义为“偏激”，其实武断地给别人下定义，就是“偏激”的表现，这也恰恰是长期受“文革”遗毒影响民众的结果。

其实被人理解与否，现在还不是我最需要的东西，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政治环境能够宽松一些，允许民间独立关注、研究“文革”，公开地进行纪念活动，就像纪念“南京大屠杀”一样，能够享受“国民待遇”。

可以先不理解我，但要包容我。

我也被国家安全局盯上过，间接找到我的单位，了解情况。其实，在现在这样的“后极权时代”，已经习以为常了。

越是让民众遗忘，就越说明“记住”的意义有多大！

◇ 不是无知是恐惧

《观察》：您对宋彬彬“复出”有过关注吗？透过此事可看到大陆官方对文革反思的无知与恐惧？

答：我对于此事一直在关注。所谓“无知”，我看并不确切。共产党政权内部有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也有多年来搞研究的人，他们不可能没意识到研究“文革”的价值，我指的是那种脱离狭隘的意识形态的的价值，他们当中也有人意识到了研究“文革”能够对人类发展史有贡献作用。将“文革”以及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苦难的中国人的历史，作为整个人类灾难史的一部分，这样的精神高度，我看他们是清楚的。但共产党政权内部有一部份人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涂”。恰恰是出于一种“狭隘”的或者对政治利益及其延展利益的现实考量，才会阻止和回避对“文革”的研究。所以，对于共产党执政集团的这种“文革恐惧症”，我认识是恰如其分的。总之，恐惧是狭隘基础上的意识倾向，而“无知”是不成立的。

《观察》：可以看到大陆官方仍是规避文革的，并严防媒体谈论、反思，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代代的人们在意识形态的驯化里终究剔除不净身上的毒素。1949年后的一切似乎都笼罩在雾里，您研究文革史料，挖掘真相时，从中体味到了什么？

答：多年来关注“文革”历史，反思的过程中，经常有一种历史与现实的“比较”性错觉。许多现实的环境、发生的事情，与40年前的一些事情很类似，或者说有“远亲”的意味。比如现在“文字狱”仍然时有发生：“不许乱说乱动”变成了网络上的“敏感字过滤”；新闻媒体一边倒式的报道方式与40年前没有什么区别；一些官方机构想当然地成为“人民”的代理裁判，代替民众去思考。

另外，在挖掘真相的时候，由于官方不开放资料，民间搜集，很不全面，所以许多线索处于中断状态。这是很苦恼的。

《观察》：扭曲历史，掩藏真相的政权是没有生命力的。揭开历史的真相是民众走出迷雾的必经之途，1966年惨绝人寰的文革爆发伊始至今，41年过去了，罪恶终会被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您认为“回避真相”对一个个体、民族、国家有何影响？

答：许多事物都遵循这样的规律：越是回避，越是无法实现“自我完善”。这道理很浅显。一个民族更是如此，一个不能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完善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任何事物都有其存在缺陷的事实，首先要承认缺陷，才能“医治”缺陷。讳疾忌医，只能让民族的肌体“病入膏肓”。不能因为短期的个人因素，或者某个党派的利益，而耽误了整个民族的进步，这样的政党会背上沉重的负债，也会让民族前进的脚步变得沉重而缓慢。

◇ “文革”卷土重来不是危言耸听

《观察》：“宋要武们”的不忏悔，或以罪为荣的心理，跟大陆官方对文革的态度关系很大吧？

答：这个问题我想这样回答，不知是否妥当：试想一下，如果在德国某个学校，某个“知名校友”的照片也登上纪念册，但里面的照片是该校友给希特勒献花，那将是怎样的一个场景？但当代的德国绝不会出这样的“大不韪”。因为德国政府以及民众真正发自内心地深入了解纳粹真相！给希特勒献花，就是给纳粹法西斯献花，就是给刽子手、血腥的党卫军献花，这种行为的丑恶在德国民众中是“心知肚明”的。正是由于德国从上到下对纳粹罪行彻底忏悔，才有了今天的良好形象。而我们国家呢？从上到下，甚至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关注”“文革”，除了掩盖真相，还长期阻碍民间的研究与关注，更遑论“反思”与“忏悔”了！所以“宋要武们”今天的“表演”，并不让人感到太意外。

其实，歪曲历史之外，更可怕的是淡化“文革”的血腥，强化“文革”中的所谓“浪漫”与“激情”，比如现在出现的一些“文革”主题餐厅，甚至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不但以罪为荣，还以罪为舞、为乐！所以“文革”卷土重来，并不是危言耸听的神话！

◇ 宋彬彬“复出”是多重祸患的彰显

《观察》：70年代末，大陆曾掀起拆除毛泽东像的热潮，很多机关单位的毛像都被清除了，人

们也很高兴。可是时至今日，毛泽东依旧被官方供在神坛上，一些蒙昧的民众仍在对“毛神话”顶礼膜拜。文革余毒对后来者的戕害可能更大于当时的灾难。您怎么看？

答：现在普遍民众的思维中，还是以“毛”为荣。因为普通民众获取不到“真相”，媒体是官方垄断的。

癌症是可怕的，如果能清除癌症病变的肌体，但没有清除病灶，这就是隐患。只能高兴一时，难以根除，后患无穷。

还是拿“宋彬彬评为知名校友”事件为例，实际上这是多重的祸患的彰显！

宋彬彬受到过毛的接见，这在普通民众心里又强化了一次“毛”的神圣性与权威性，只要与毛有过接触，就是一种终身的政治荣誉，就会终身受用不尽，这是个人崇拜的遗毒的继续，此其一；宋当年给毛带红袖标，成为“红卫兵”暴力升级的诱因之一，给毛带袖标的“红卫兵”，公然出现在正规的校友纪念册中，就算不属于主观恶意，也在客观上起着极为恶劣的影响。当年受到“红卫兵”风潮伤害的受难者，今日再一次被伤害——“杀人放火金腰带”的古训现实得令人胆寒！此其二；淡化了“文革”的血腥，掩盖了真相，转移了年轻人的视线，继续进行“遗忘”教育，此其三；在某种意义上讲，渲染了“文革”的“荣誉感，回避了羞耻心，混淆了是非荣耻，此其四。

我想，灾难本身是可怕的，但更可怕的是灾难的重复发生。

“宋要武们”的现象，也在侧面反映出，官方在“文革”反思方面的“不作为”甚或“反作为”。

◇ 每个人都可以做历史义工

《观察》：您一直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可事实上清算文革就是清算毛泽东，目前的形势看大陆官方是不可能正视文革的，那么您还会在此方面做怎样的努力或尝试？

答：继续收集“文革”资料，继续撰文呼吁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拯救人类记忆”的工程中，协助王友琴老师或者我们彼此帮助，做“历史的义工”。调子唱得再高，都不如实践，哪怕迈出一小步，都是有意义的。

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官方，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民间的努力，来收集、保存、整理文革资料。

其实，我对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因为途径越来越多，虽然有所谓的网络屏蔽，有官方的媒体垄断，但我们都有办法解决了。历史属于全民族，不是属于某个个人更重政党的，谁都有权去了解真相，有义务去维护真相的传递。

同时，我也反对以“文革”的方式去对待“文革”历史，那样，我们永远也跳不出“文革”的怪圈，也无法“自我完善”。

个人的能力终究是有限的，只能呼吁有识之士，有经济实力的人士更好，加入到拯救记忆工程的行列中。



从自身做起，每个人都可以做“义工”，这只是选择问题。

所谓“文革”博物馆，其实，首先应该建立在我们的心中，建立在我们的行动上，其实博物馆已经开始“动工”了，“竣工”只是时间问题。我们期待着。

□ 原载《观察》网站

~~~~~

【难忘岁月】

## 我的上书回忆

• 萧瑞怡 •

一九六八年五月，我向毛泽东写了一篇上书。那时我是新化一中高49班在校毕业生，年龄二十岁。上书包括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改革土地制度。这是我着重阐述的部分。我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摆出了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实际状况，论证了生产关系的不适应性，从而提出了借田借土制度的主张。第二部分，废除人为的阶级斗争。在这部分里，我就对四类分子的长期专政和不必要的阶级斗争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对四类分子应采取教育争取的看法，一视同仁对待其子弟，停止文革中的派性斗争，以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第三部分，废除个人崇拜活动，解放人们思想。在这部分里，我总括了个人崇拜七大罪状：第一，个人崇拜造成了个人独裁，两口子独裁，小集团独裁；第二，个人崇拜浪费了人力、物力；第三，个人崇拜减低了教学质量；第四，办学习班浪费了时间；第五，个人崇拜造成了人的虚伪性；第六，个人崇拜破坏了外交关系；第七，个人崇拜尤其束缚桎梏了人的思想。接着，我从领袖和群众的关系，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观点，说明了废除个人崇拜的必要性。第四部分，以严法治国。在这部分里，我提出了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主张法要严、刑要当，除恶助善，国泰民安。第五部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和群众打成一片，可以避免官僚主义。第六部分，实行革命的军国主义。在这部分里，我提出要发展科学技术和人人习武、个个练兵的主张，以实现民族自强，抵御外来侵略的目的，并开创出一个使敌闻风丧胆，不战而胜的强盛国家的局面。

上书计有万字，在当时提出这些观点，特别是前三个部分，哪怕只触及一点，都可定下现行反革命罪。所以当时一位政法工作者说，上书是带纲领性的，性质是极为严重的。

那么，我这样的思想是怎样产生的，上书的经过如何，以后的遭遇怎样，案件如何处理，逆境中我又写了些什么？现一一回忆于下。

### 一、写上书的思想基础

谁都知道，人的思想意识是由客观存在所决定的，人不可能凭空产生什么思想。要问我为什么会产生那些“反动”思想，简单的回答，那就是社会生活赋予我的。

我出生于一个贫农之家，长期在农村生活。大跃进、共产风造成三年苦日子的严酷生活，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一道伤痕。

一九五八年，我十一岁。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正是这年树立起来的。这年出现了两样稀罕事：一是土法炼铁，二是办公共食堂。土法炼铁我帮助大人捡了矿石。那种炼法如何窝工浪费，如何毁坏森林而毫无收益，给我的印象且不说了，只说公共食堂给我的感受。

当时，我们村子里一百多户人家分成两个食堂就餐。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标语：“公共食堂好，菜香饭又饱；吃饭不要钱，越吃越香甜，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起初，公共食堂的饭菜虽不怎么香甜，但好歹能吃饱肚子。可时间一长，当田地荒芜，长苗时一半禾一半稗的时候，人们啼饥号寒的日子也就降临了。象我这般年龄的孩子，每天定量只有半斤大米，那时用的十六两一斤的秤，今天的五两即是那时的八两。我早三两，午二两，晚三两，真是饿得慌。菜不是萝卜汤，就是咸萝卜，三百六十五天见不到几个油星子。那时，猪肉十六元一斤，鸡蛋一元一个，年底过年能分到半斤猪肉算是有口福了。为了填饱肚子，我跟随我父亲上山挖蕨根、土茯苓等充饥。我吃了不少糠粃，甚至我把牛栏屋上面人家堆放了几年作燃料用的绿豆壳也拿来磨成粉吃了。肚子是肉长的，那容得下这些粗糙的食物。咽下去还不太难，屙出来可就真的难了。

以后的日子更是每况愈下。我看到有的夫妇为争一口饭吃打架分了家。此时，盗贼四起。公人家就要烧火煮，烧了火瓦上就冒烟，冒了烟大队干部就可顺藤摸瓜，摸到了“瓜”晚上就开大会斗，不斗得你喊爹喊娘决不放手。斗了还是有人偷，瓦上还是要冒烟。于是乎，干脆来一个釜底抽薪。青年突击队员们扛起锄头挨家挨户将灶砸个一斩平，锅子没收作为废铁上交公社以抵炼铁的指标数。到了这般“绝灭烟火”的地步，饿倒人的严重现象也就发生了。一九五八年，彭德怀回到湘潭坞石，看到“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的时候，也仰天长叹“来年日子怎么过”而决心为人民“鼓与呼”了。一九六一年刘少奇回到花明楼，看到自家屋前的梧桐树皮被剥光吃了，一数炭子冲的人有不少不见了的时候，也举鞭抽击自己的灵魂，丢掉了“粮食多了、煮酒熬糖”的想法。此时，倘若毛泽东他老人家也象青年时代一样，夹着雨伞在民间跋山涉水，那么也不会听不进言而主观臆断了。

三年苦日子，招来了人们的怨恨，我也产生了朦朦胧胧的不满情绪。正当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之际，“三自一包”就象一场甘露雨来到了人间，它拯救了嗷嗷待哺的饥民。短短年余时间，农业得到了复苏，继而粮食巨增，物价猛跌，农民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不过，“三自一包”这一财富之神仅仅在农村一晃即过，代之而行的是那种以生产队为基本生产单位又留给社员适量自留地的集体生产形式，并被长期固定下来。其间佐之以“农业学大寨”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和批判资本主义的狂风暴雨，使得农业生产象一匹患病的驴子拖着沉重的车，艰难地向前挪步。

社会犹如一个大实验室，哪种生产形式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哪种生产形式阻碍甚至破坏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知道得清清楚楚，我亦深有体会。这为我后来思考土地制度的改革打下了深深的思想基础。

进而要说的是，一个人的行为往往与他的理想紧密相关。当一个人步入青年阶段的时候，正是青春的热血与理想交织燃烧的时候：对未来充满憧憬。方志敏烈士在回忆他的青年时代说道：读了《拿破仑》，就想做将军；读了岳武穆，就想驰骋沙场。我呢，的的确确也是如此。那些名传记，诸如《马克思传》、《毛泽东同志的少年时代》、《富兰克林》、《列宁回忆录》、《寇准》、《魏源》、《康有为》等书，于我有极大的吸引力，一本《革命烈士诗抄》更是爱不释手。我力图效仿这些伟人，用“生做泰山，死当河流”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立志做一个社会改革家，造福于人民。我如饥似渴地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哲学史》、《世界通史》、《政治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记得连学校图书室里那张霉黄得难闻的《资本论》也读了几天。一个人一旦确立了理想，就必然会为之去奋斗。

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刮来了。此时，我正好高中毕业，准备全面复习，迎接高考。可上头来文说，暂时停止高考，坚持在校复课闹革命。于是，同学们纷纷加入红卫

兵，批邓拓，批吴晗，批廖沫沙。继而批学校里的黑帮，揪学校里的走资派。接着又搞大串联，各种组织纷纷揭竿而起。有的加入“湘江风雷”，有的加入“孙大圣”，真枪实弹，武斗迭起。后来，我由衷敬仰的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了，这不能不使人震惊。阶级斗争之火到处乱点，更不能不使人认真思索。尤为甚者，主席还健在，有人就要我们搞顶礼膜拜，天天在主席画像前早请示，晚汇报。我想，历代以来，只有当皇帝临朝时，手下的臣子才下跪，呼万岁，如今遍及百姓，这教人怎样去想？那时，我随便走进一家饭店，就发现有七八十个主席画像：夹把伞去安源的，跟红卫兵握手的，披长风外套的，穿中山装的，坐着的，站着的，饭店成了主席像展览的地方。再看书店的主席像章，有大于银元的，有小于扣子的，有圆的，有方的，有菱形的，有长方形的，要有尽有。再到书店，为是《毛泽东选集》，就是《毛主席语录》。至于城市广场，设有哪处不矗立着一个毛主席的巨大塑像。世界成了主席一个人的世界了。

事情发展到一定程度，往往会向相反方向转的。比方，我在饥困的时候，你救济了我几升米，我自然会感动得眼泪直流，并会将你的大恩大德永记于怀。但倘若你施恩于我，就要我天天向你膜拜，孝之如父母，敬之如菩萨，则我又会对你有另外的看法了。当个人崇拜到了登峰造极的时候，我再忍不下去了。引起我最反感的，也是点燃我思想之火的，就是做语录操。当司令员用“下一定一决一心一不一怕一牺一牲”等语录来指挥我们做操的时候，我就愤然离开操场。我好似五脏来血，气得真想拔剑斩地：难道我们都是奴才不成？难道芸芸众生都是蚂蚁不成？我恨林彪这个奴才兼野心家，我恨“四人帮”这班恶棍，我叹息毛主席主观、武断、个人专制、忠奸不分。然而在那个红色恐怖的年代里，在人人高呼“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的情况下，我没有别的道路可走。“毛泽东”这个名字的威力犹如上帝，而上帝的错误除非上帝本身意识到才能终止。于是，我产生了上书的想法，我想要亲自到北京去见主席，如果门卫不让我见，我就将自己全身捆绑求见。酝酿几天后，我定下决心，并把这一想法告诉了我的同窗好友魏书程。

## 二、写上书的经过

### （一）第次一写上书。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我开始着手写上书。一写，思潮滚滚而来，犹如长江之水：土地问题，阶级斗争问题，个人崇拜问题，强国安民问题，都想付诸笔端。个人崇拜是我最反感的，也是引爆我思想火花的导火线，但与土地问题、阶级斗争问题相比；还处于次要地位。所以，我把“改革土地制”作为第一部分写。其二是“消除人为的阶级斗争”，其三是“废除个人崇拜活动，解放人们思想”，最后写其他强国安民的主张。

我写时是避开人的，或在教室写，或在寝室写，写一张，锁一张，无人知晓。

前三个部分写好了。这时，我的另一所谓同窗好友叫伍毅群的，见我昼夜秘密写东西，就问我写什么，并要求看看。起先我不想告诉他，后经他反复说：我又考虑他出身不好，平时言谈与我相近，于是我把刚写好的第三部分给他看了。给他看前，我点点张数，共二十一张。谁知他看后还我时只有十九张，少了第二张和第二十张。这两张是内容至关重要的两张，前一张承上概括了集体生产形式的弊端和人为的阶级斗争造成的祸害，后一张总结了个人崇拜的罪恶。因此，一旦这两张失落，那我整个的“反动”思想就将彻底暴露。事关重大，我立即找到伍毅群，并将他带到偏僻的寝室楼上，询问那两张稿子的事。开始，他抵赖说不知道，后经我再三逼迫，他才承认拿了。他说是上面派他来监视我的，是要他来拿的，他说要把稿子交给学校军管小组。我恳求他还给我，我申明我是要光明正大到北京去上书的，不是写匿名信。我说最多半个月我的死活就知道了，请他现在不要泄露。他听不进，口口声声说我是现行反革命。事情既到如此地步，我跟他自然是一场生死搏斗了。其时，快下晚自习了，同学们即将回到寝室。

我急得心都快跳到口里，我扑向他，搜他的袋子，没有。左查右看，原来在他手里紧紧握着。我用力抓住了他的手，他拼命反抗。昏暗的灯光下，两个人扭作一团。经过一阵搏斗，我咬破了他的指头，将那两个纸团抢到了手。然后，我匆匆将全部上书稿从我寝室的课桌里取出来，投入资江大码头旁边的一口井里，掉转头往冷水江方向逃奔。后面追兵如火，我跑得更狂。凑巧的是，我刚跑出校门时，天还只下毛毛细雨，可这时候，天哗哗啦啦下起大雨来，越下越猛，犹如瓢泼。老天助我，暴雨把他们拦回去了。我跑到新化锡矿山，托魏书程母亲之福，给了我三十元钱和一些衣服，绕道赶到涟源车站远走高飞了。几天后，通缉令发布新化、邵阳、长沙等地。其实，通缉令仅仅是根据伍毅群的密告和我平时的言论胡乱写成的。

## （二）第二次写上书。

从学校逃出后，我来到了湘乡山枣厚丰大队周立桂同志家重写上书。周是魏书程同学的姨父。

花了八天时间，上书六个部分全部脱稿。在这里看了我上书中第一部分的有周立桂，看了全稿的有周的邻居贺松林。贺对我大加赞赏，而周持否定态度。周看到“陈永贵同志是全国的一面红旗，我愿做全国的一面黑旗示范于天下”这一句时，愤愤地说了一句，“毛主席讲陈永贵好好好，连讲三个好字，而你就说陈永贵不好……”我听后忐忑不安，便匆匆告别他家，搭火车到与涟源接界的萧塔孚家。萧是我初中的相知同学。我去的目的，是想征求他对我上书内容的意见。他一见到我，大为惊喜，并告诉我，到处在通缉我。他看完上书后，说我太鲁莽，并劝我不要去上书。我听后犹豫不决，最后，我在去长沙途中，又毁上书于火车厕所中。

## （三）第三次写上书。

上书虽毁了，但我又觉得可惜。我眼前面临绝境，无处可以安身。逃往香港吧，抓着了会弄得个身先死而志未遂。逃往新疆吧，身边的钱所剩无几。想来想去，决定铤而走险；走上书之路。于是我在湖南宾馆找到了一位服务员叫罗顺初的，他是我的同乡，在他家里我又秘密写起上书。这一次只花了五天时间就全部写好了。完工之际，罗要求我给他看看。他看后大为惊恐地说：“怡宝，我不知你的思想落到了这个地步，要是在五七年，你要打个大右派！”我听后，又怕他走漏风声，等他刚出门，我就匆匆离开他家。

我来到湘江岸边，开始冷静地思考：这个世界的确在颠倒走路，与我的思想格格不入，但非一人之力能扭转乾坤。于是我愤然将上书投入邮箱，搭船往洞庭湖逃生去了。

## 三、流浪洞庭湖

在去洞庭湖过沅江途中，我即改名为萧远江。一则是隐匿名字以利逃生，二则是勉励自己，要象江河一样，虽奔程遥远，曲曲折折，但最终是一定要流入大海的。

那时流浪，不象今日一样那么容易。当时三日查籍，五日戒严，经常抓流窜犯，没一天安宁日子过。尽管如此，但毕竟洞庭湖地域广阔，劳动力少，所以还是聚集有湖南、湖北、河南、山西、安徽、浙江、广东等十几个省的流浪者。这些流浪者中，有多数是为了出来赚口饭吃，也有少数是出于某种原因而来湖区避难的。

我初到洞庭湖，是六月中旬，正是扮禾季节。我找到千山红农场，帮助农场职工扮禾。然而怎奈湖区蚊子多，自己没有蚊帐被窝，晚上只得用稻草遮身。稻草怎挡得住蚊叮。末了，我得了疟疾病。一发高烧，我就卧床，烧一退，我又打禾，疟疾发烧、退烧有周期性，我卧床打

禾也行周期性。如此豁出命来干，才赚到了十五元钱。随即我向人家买了一床破蚊帐和一床不上五斤的旧棉絮，这就是自己在外流浪的行李了。

流浪者不能每天找到活干。忙时湖区人请你帮忙，闲时一脚踢开，并且派民兵戒严抓流窜人员，抓到了又把你的钱没收，遣送回家。我为找活干，为躲避戒严不知想了多少办法。也不知吃过多少苦头。回首八百里洞庭湖，哪处没有我的足迹？我抗着酷暑在钱粮湖扮禾，忍着蚊叮在大通湖月夜下开沟，顶着严寒在荣家湾修路，冒着风雪在漉湖柴山里过年。我常常向着湖泊呼啸，望着长堤沉思：浑浊的湖水呀，你何时才有清澈的日子？弯弯曲曲的长堤呀，何处才是你的尽头？无可奈何之际，曾填有《菩萨蛮》一首：洞庭湖泊江风烈，长堤一片伤心色。独自莫凭栏，心情激浪翻。男儿空有志，效国无名字。把酒问苍天，中州何日见？

#### 四、反省交代，案件处理

我在外流浪到了两个年头上，想起家中父母。一九七〇年五月，我偷偷回到新化维山公社我舅舅家里。我想让我舅舅把我父母接来见见面。谁知我的亲戚，包括我舅舅早已被有关部门的人做了思想工作。意即我一回来，就要送交政府，否则就如何如何。我舅舅是大队支书，觉悟更高，所以我一到他家，他就不准我再外出，要把我送交公社，让我去坦白交待。这样，我就被他带到了我家所在地科头公社大院。在群众的检举揭发材料面前，我不得不将上书内容全部交代出来。我做好了坐牢的准备，因为问题的确不轻，为什么甘愿走这条路，实在是因为在外流浪，那风刀霜剑的日子不易过。

根据我的反省交代以及群众的检举揭发材料，公社作出了“关于现行反革命分子萧瑞怡的处理意见”上报区政府，区签署“逮捕法办”四字，且将我的“罪恶”归纳成下面四点：

“一、疯狂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把全国人民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说成是个人崇拜。

二、恶毒攻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三、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为刘贼歌功颂德，鼓吹‘三自一包’、分田到户，大刮单干妖风。

四、极端仇视无产阶级专政，大唱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高调，为阶级敌人鸣冤叫屈，抹杀毛主席的阶级路线。”

随即我被送到了县公安局。据说法院为此案处理争论激烈。大多认为该判极刑，而法院院长张吉山及军管小组李副部长这两位主要负责人不同意。正在此时，上头来了一个文件，说是知识分子因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枪毙的人太多了，以后要从轻处理。这样一来，我才得以死里逃生，他们有了理由，说一则念我是学生；二则考虑出身好最后将我免刑释放，回乡由贫下中农监督改造。记得我从法院出来，李副部长追上我说：“年青人，敢想、敢说、敢做，敢为么……”可见人心！

#### 五、逆境中的探索

在农村我整整改造了八年。八年面向黄土背朝天，我成了地地道道背着“反革命”罪名的贱民。游团示众次次在场，“批斗大会”回回有份。以后莫说本人不能参加升学考试，就连我的弟弟们读书、参军也不可能。一九七八年，形势好转，我开始当民办教师。经要求，给我平了反、但是，八年磨励，使我对“吃大锅饭”的生产形式更加深恶痛绝，也使我更加增强了改革农村经济的决心。一九七八年，我看到了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依然有增无减，便大胆向《光明日报》写了一篇《生产关系改革浅见》的论文。在此文里，我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作为依据，

结合农村经济的现状，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肯定了“三自一包”责任制的重大作用。后来该报理论部回复说：“不宜刊登，稿子已转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研究所。”

一九七九年，全国农村刚刚开始进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又斗胆写了《共产真义说》一文，分别寄给了“中共中央、全国政协委员会和中国未来研究会，并以此文作为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生论文。这篇论文有近两万字，包括八个部分：（一）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略谈；（二）根源在哪里；（三）建国三十年来农业生产发展状况回顾；（四）论共产的实质；（五）包田到户是体现共产真义的生产形式；（六）解答几个问题；（七）定额生产是解放工业生产力的有力措施；（八）结束语。这篇论文实质上就是原上书中第一部分内容的加深。因为那时候，人为的阶级斗争没有了，个人崇拜也废除了，唯独对农业经济，生产力问题的看法依然如故。所以，我把笔端指向这里，批判吃大锅饭，力图实行生产责任制这一富民之策，强国之方。可是，这篇论文寄出后，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我常常叹息，自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后，废纸满坑满谷；而我用心血写的东西，哪张报纸，哪本杂志敢让出一版使之刊登，中国的言论啊……

## 六、结束语

我写上书距今已整整二十年了，时至今日，我的宏愿已大多实现，我真不敢相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步子竟迈得这么大，弯转得这么急。十年前，谁喊改革，谁就有可能挨批受斗，甚至坐牢杀头。而今天，谁反对改革，谁也会遭到唾弃。颠倒的世界如今又正过来了，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之幸，是我们炎黄子孙之幸。尽管今天改革中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应当坚信，改革的方向是没错的。只有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深化改革，我们的国家才能兴旺发达。我认为：私产财富，公出精神；法安天下，民主出自由。我们的国家还有待进步，但今天的方向是正确的。

过去、现在，我一直坚守着“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格言。祖国命运，无时不虑；振兴中华，五日不思。然而政治体制改革远未与经济体制改革匹配，治政方面的人才并非科技人员那么斤两分晓，庸人政治虽说误国误民，然而精英政治不能出台时就只有传统政治扮主角了。想做王安石，未必能做王安石。我把自己比作一个茶壶，虽说“冷落无人顾”但“淡真气自豪”；要问“胸中何所有？——清水作波涛。”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但愿天下一切有志者有才者，共同奋斗，将人类社会这只大船，驶向和平、和谐、自由、民主、繁荣、发达、公立社会的港湾！但愿后来的有志者有才者，能人尽其才、效力于世！

萧瑞怡

1988年5月于冷水江

## 附（一）

最高指示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通缉令

肖瑞怡，男性，现年21岁，家庭出生贫农，本人系新化一中学生，家住新化县科头公社桃林大队。

该犯由于忘本变质，走向了反革命道路。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肖犯借“四大”为名，替阶级敌人翻案；勾结保守势力，蒙蔽一部分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竟发展到整毛主席的材料，恶毒攻击谩骂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江青同志；鼓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为刘少奇大唱赞歌。当被我革命造反派发现揭发后，肖犯竟准备行凶（未就），我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与肖犯展开了猛烈的斗争，肖犯自知站不住脚，于68年6月17日深夜畏罪潜逃。

为了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希各地驻军、专政机关、革命造反派大力协助捉拿归案。如拿获，请通知新化一中红代会。

肖犯只有早日自首，才是唯一出路。

湖南新化第一中学红代会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

附（二）

#### 中共新化县委落实知识分子办公室的推荐信

XXX同志：

我们怀着惜才之心，呈上肖瑞怡同志写的《上书本》，并将他死里逃生后的情况作个简介，请审示。

这部《上书本》，是肖瑞怡同志于一九六八年五、六月向毛主席写的“万言书”，可说是一部除弊兴利的治国纲领。当时他是新化一中高49班的优异生，毕业后留校“复课闹革命”，年仅20岁。因写这部《上书本》遭到通缉、逮捕、审讯，从此，身处逆境，游团，批斗，不能升学，不能安排工作，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坎坷之路，直到一九七八年才安排在科头中学任民办教师。

在备受折磨的逆境中，他矢志不移，自强不息，“位卑未敢忘忧国”，热衷于哲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探求富民强国的改革之路，于一九七九年写了一篇长达四万五千字的《共产真义说》，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大量事实，阐明共产并不是吃大锅饭，提出了农业包田到户，工业责任到人的改革措施，连同《上书本》投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获得了研究生准考证。旋因当时的政治背景，以考试成绩太差未予录取，并以“在目前还无定论”，退回原稿。一九八一年写了《生产关系改革浅见》投寄《光明日报》，主要论述“三自一包”，责任制的生产是裕民之策，富国之方，“因不适合本报刊用”“故转寄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下落无音。在深感此路不通时，投入文艺研究，于一九八二年，一九八三年写了一篇五万字的《浑名历履表》，反映我国三十余年的政治经济和思想状况。这些努力，虽然都未奏成就，但至少反映了他勤奋自学，敢于独立思考的顽强精神，表述了立志改革，振兴中华的赤子之心。据科头中学师生反映，肖瑞怡同志为人耿直，好学不倦，且天资聪颖，他过去只学过俄语，未学过英语，但为克服该校英语师资困难，勇于接受任务，边学边教，结果他所教英语班考试成绩在全区中学中名列前三名。

今年八月，我们在接待来信来访中，才看到肖瑞怡同志的《上书本》，立即找当时审讯过他的专案人员进行了调查核实，并访问了他所在学校的师生及所在乡村的干部、群众，对他的过

去和现在进行了考核。他本人也向我办写信，陈述了书写《上书本》的由来和以后的遭遇。（来信附后）九、十月省地检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组和有关报社，电台记者先后来我县看了《上书本》和全部案卷，并找肖瑞怡同志多次谈话，都一致认为，从他的《上书本》和论文中，显示了他青少年时期冒死进谏的赤子之心的卓越的政治见解，他在逆境中表现了坚毅不拔、立志改革的斗争精神，是一个忠心耿耿，胆识兼优的人才。可惜时运不济，报国无门，几遭夭折。值此大兴四化，选贤任能之际，不能再让他蛰居深山，无用武之地，如能重用，参与政务，使之扩大视野，广约博采，舒展运筹，扬其所长，干四化事业是有所作为的。但他不属科技之类的人才，且限于现行的人事制度，破格选用难度较大。为此，特向中央有关领导推荐，是否可取，请批示。

中共新化县委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办公室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